

一九八一年

——一九八三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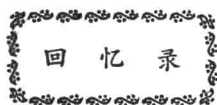
党史资料简报

第1期

中共朝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

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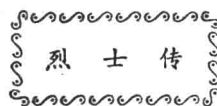
编者的话



回忆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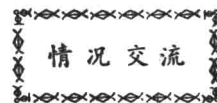
从长征到抗日的回忆片断

奔向革命圣地——延安



烈士传

宋国祥烈士



情况交流

各县、市已建立党史资料征集机构

编 者 的 话

《党史资料简报》是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主办的不定期综合性刊物。它的任务是：交流各县、市及地直单位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经验，发表老同志撰写的革命回忆录，介绍地方党的历史资料。为完成这一任务，本刊将通过回忆录、烈士传、革命故事、经验交流、动态介绍等栏目，陆续刊发党史资料。望全区广大干部、党史工作者踊跃投稿。稿件要求内容丰富，形式新颖，文字简炼通顺，史料真实可靠。凡所发稿件文责自负。

本刊选用稿件一律给稿酬。送给本刊的革命回忆录稿如未被采用，不退稿的，发一定数另的笔墨费。其它未被采用的一律退稿。

本刊问世后，愿随时听到广大干部、群众的改进意见，以便指导我们把刊物办好。

从长征到抗日的回忆片断

吴 达 胜

我是江西瑞金县壬田区镇头乡人，从小父母双亡，抛下哥哥和我，都是孩子，靠给人家放牛、打短工、拣粪来维持生活。一九三〇年家乡解放了，分得了土地和房屋。我非常热爱和羡慕为穷人求解放，打天下的红军战士，一心想当红军。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五日，我和几个小伙伴到区招兵接待站报了名。参军后，因为我年令小，被分配去学吹号，当了一名号兵。嘹亮的军号声，战士振奋，敌人胆寒，从五次反围剿，到长征路上。从宝塔山下，到抗战前哨，一把铜号十几年没离我的身边。到解放战争时期，我担任了连队领导，才把铜号交给了新的同志。

军长爱我胜长兄

我学会吹号后，分配到二十二军团独立三师五团五连当号兵，经常看见全军敬爱的军长罗炳辉同志。他身材魁伟，气宇轩昂，对战士亲如兄长，体贴入微。一九三五年，在长征路上，进入贵州境内我得了重感冒，发高烧。集合出发时，我躺在山坡上，两腿发软，怎么也站不起来。同志们正围着我犯愁，罗军长走过来了，关切地问：“司号员怎么啦？”同志们向军长汇报了我的病情。军长马上

派人去叫卫生部的同志。卫生部的同志来了，给我找了止痛药吃下去。军长看我吃下药，又让马夫把他的骡子拉过来，让我骑上，并且告诉马夫：“你跟着他，不许丢了，丢了你负责任。”安排妥善，罗军长才赶往前边去了。

我骑上军长的骡子，心里非常不安。军长指挥全军，担子那么重，还把骡子让给我，我怎么坐得住呢？我几次要下来，马夫不让。这时侦察参谋曹振辉同志拉着一匹给参谋们驮东西用的骡子过来，看见我骑着军长的骡子，也觉得不妥当，就说：“不要骑军长的骡子了，骑我们这匹吧！”我说：“这还可以。”马夫才让我下来。

我骑着参谋用的驮骡，仍然感到不合适。参谋们工作需要的骡子，我怎么能骑呢？同时，吃了止痛药，身体感到舒服了一点。这时通讯参谋过来，他不知道我闹病，我就让他把骡子拉走了。我在后边慢慢地坚持走。

快赶到驻营地时，我远远看到军长站在山坡上，正在焦急地盼望。原来到了驻地之后，军长便来打听我，听说我没骑马，非常发火，把马夫和通讯参谋狠狠批评一顿，命令通讯参谋牵着骡子回去



接我，正这时我赶上来了。军长见我上来，才转怒为笑，亲切地问我：“小鬼，好点吗？”我说：“军长，我好点了，能走了。”军长摇摇头，命令通讯参谋再出发一定要把骡子给司号员骑。

我从小就失去了父母，只有一个哥哥，也顾不了我。旧社会在我的身上留下的只是凌辱和仇恨。是参加了革命队伍之后，才使我知道人间还有温暖，还有爱。罗军长那胜过父兄的真挚的阶级友爱，给了我巨大的温暖和力量。

雪 山 忠 骨

大约是一九三五年五月，我们的队伍来到了夹金山下，准备越过这长年冰封雪盖，飞鸟绝迹的大雪山。过雪山前，每人都准备了过山的干粮——每人身上带了十来个煮熟的土豆。政委何长工同志作了动员报告，分别召开了党、团员和全体指战员大会，互相之间开展了挑应战。根据身体情况结成了互助对子。出发后，每隔不远就有军部宣传队的同志做宣传：“同志们加油啊，发扬艰苦奋斗，团结友爱的精神，战胜困难，跨过大雪山。”张保、“二杆子”我们几个挑皮的小鬼的嘴也不饶人，一边走一边和宣传队的同志们打诨：“放心吧，你们过得去我们就过得去，”“你们可不要嘴上挺硬，两条腿跟不上。”

第一天走了有五、六十里地，爬到了半山腰，便露营休息。寒风刺骨，同志们虽说穿着棉袄，但里边的棉花早都瘩瘩疙疙了。冻得睡不着觉，不一会就起来由班长领着跑一圈。第二天进入最艰苦的阶段。山上积雪五六尺深，没有道路，越走越艰难。寒风凛冽，空气稀薄，使人喘不过气来。和我结成对子的同志姓张，身体很

弱，我帮他背着枪，互相搀扶着都呼哧呼哧喘着粗气。这时谁也不能倒下去，倒下去必须赶快拉起来，不然就起不来了。如果滑到雪窟窿里，一下就见不到人影了。我们终于爬到了山顶。到了山顶上，一刻不能停留，互相拉着，拽着，推着，拥着，连出溜带滚，一气滑行一百米下。这时觉得空气特别新鲜了，喘气也缓和了，张保、“二杆子”我们几个人缓和了一口气，互相鼓励着，又返回山头去接应后边的同志。过了山头看见几个同志正拽着大个子张德胜艰难地向上爬，我们赶快去支援。张德胜同志身体长期闹病，在山下动员的时候，他表示坚决要和大家一起爬过雪山。如果爬不过去，死了就埋在雪山上。快到山顶时，他已经完全不行了，同志们架着他，他的两腿还坚强地向前迈，终于爬到山顶。俯视山下，望着前方的红旗，望着前进的队伍，他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，他的呼吸低微了，他的两眼渐渐地合上了。等到大家把他架到一百米下空气充足的地方，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。

对着这位坚强的战士，我们没有眼泪，在山坡上挖了一个雪坑，用洁白的冰雪把他掩埋。

告别了战友，我们又踏上了征途，但是同志们不断频频地回头，望着那新隆起的雪堆，脚步更加沉重和坚定。

奥 坡 突 围

抗日战争中，一九四一年我们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一营在山西汾水县攻打奥坡。这是个小镇。头天晚上战斗打响，打进镇里之后，鬼子负隅顽抗，躲在窑洞里不出来，战斗打了一宿，敌人派来了援军。为了防止吃亏，部队决定撤退，由我们一连担任掩护。龟缩在

窑里的鬼子，知道他们的援兵到了，倾巢出动，妄图和援军配合。我们连咬住了敌人几个连的兵力，和鬼子展开了残酷的肉搏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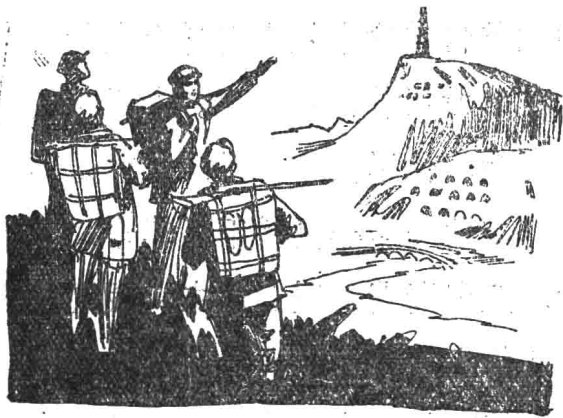
战斗打得十分激烈，三拼两拼，敌人虽然遭到很大伤亡，我们连也所剩无几了。我是一个号兵，平常不带枪，便从被拼倒的鬼子身旁拣起一条三八枪，准备和敌人拼杀。这时一个连鬃胡子的鬼子窜过来，他头戴钢盔，呜啦呜啦喊着，凶狠地向我刺来。我尽量使自己的头脑保持冷静，看准鬼子刺刀刺过来，两腕一用力，轻轻拨开，顺势刺了过去，一下刺在鬼子的咽喉上。又过来一个，我同样以后发制人把他刺倒。我一边和敌人拼杀，一边后退。这时天已拂晓，敌人的机关枪、小钢炮都支起来了。我一看不能再停留，抓住空隙，靠近了一堵土墙，自己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力气，一手拎枪，一只胳膊挎上墙头，翻身滚了过去。未跑多远迎面横着一道几十米宽，十来丈深的大沟。不容犹豫，我把大枪往怀中一抱，两腿一蹲出溜到大沟底下，然后将大枪背在肩上，又爬上了沟坡。到了沟西，回头一望，沟坡立陡立崖，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爬上来的，走了几步，前边沿着黄河挖有一趟战壕。一宿的战斗，这时甩掉了敌人才感到疲乏。浑身软得象滩泥，我只觉得头晕目眩，两腿发软，一头栽到壕沟里，昏昏沉沉地睡起来，从早晨太阳出来，一觉睡到太阳落山。我耳边忽然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说话，睁开眼听了听，又趴在壕沿上偷偷往外一看，见大沟对面有几个鬼子，正蹲在一起呜哩哇啦地研究地图，我把大杆枪端起来，下意识地摸摸身上，没有一粒子弹，拉开枪栓，见里边有五发子弹。鬼子讲武士道精神，拼刺刀时枪膛是不顶子弹的。从昨天晚上我拣起这条枪，还没顾得看里边的子弹。这时我向枪膛里顶了一棵子弹，从草窠子里

把枪口顺出去，瞄准鬼子就是一枪，一个鬼子应声倒地，剩下的鬼子不知是从哪儿打来的枪，抬起倒下的鬼子就跑。我接连两枪又撂倒了两个。这时镇上的鬼子兵都端着枪出来了，我赶快拎着枪，顺着战壕跑。天已擦黑了，当地游击队听到枪声赶来，发现我在踉踉跄跄地奔跑，上前把我扶起，问明我的部队番号，找来一头毛驴，把我送回部队。团长文年生同志见了我，紧紧握住我的手说：“小鬼，回来啦！你们连队为了掩护部队撤退，都壮烈牺牲了，就剩下你这么一个小家伙回来！”

我们革命的胜利，我们的幸福生活，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，洒热血换来的。当今天回顾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的时候，不能不激起巨大的心潮。我们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，用他们的高贵品质和献身精神时刻鞭策自己，在四化建设中努力工作，永远前进！

（崔志政整理）

《作者简介》吴达胜同志，1913年5月生于江西瑞金县，1931年5月参加红军，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司号员，侦察排付排长，付连长、连长，转业到地方任矿务局科长。1980年离职休养。



奔向革命圣地—延安

宿 非

参 加 八 路 军

我生在山东省莒县招贤镇西黄埠村一个农民家庭里。从小跟着伯父在济南城里读书，当我念到中学二年级时，发生了“七·七”芦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爆发了。日本鬼子进入山东省德州一带，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学校不能上课了，我就回到了家乡。在一九三八年那时的山东农村，像“胡传奎式”的草头王纷纷出世，“司令”如牛毛，打着抗日的旗号，向老百姓要粮饷，实际上并不真抗日，反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。这年秋天，我们那里来了八路军一小股队伍，进村后，就让村长给号房子找住处。村长安排在那他们就住在那，不挑不拣，对人挺和气。不让人们叫他们“老总”，要称同志，可他们对年岁大的老乡称叔叔大爷、大婶大娘，年纪轻一点的就兄弟姐妹相称。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，纪律严明。深秋季节，大部分庄稼都打完了场，到场院里吃点花生是很随便的事，可这小分队的全体同志就住在场院屋子里，还在场院旁站岗放哨，他们一个花生角都不动。每到晚上队伍都集合在一起，在村里唱歌，记得多

是唱：《大刀进行曲》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游击队战歌》等。歌声吸引着很多很多的群众，他们就借着这个机会向群众宣传，讲“统一战线”、“论持久战”等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。老百姓们议论：“别看这个队伍装备不行，可和其他军队不一样，这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哩。”八路军的到来给我的幼稚心灵播下了革命的种子。一九三九年三月初，春节刚过，天气渐渐的暖和起来，我们村里由于战争而停办的小学，由村里几位头面人物的主持，又恢复了。官派的老师早走了。没办法只好就地取材，让我的一位远房表兄和我的一个堂兄任教。我无事也经常到学校去义务帮忙。有一天，从东山里来了几个庄稼院打扮的人，没带武器，找到村长说，他们是八路军的民运工作团，来这一带工作。村长就把他们安排在学校里，从此后这个小学校的办公室也就成了八路军的工作团，人们围前围后，听他们讲革命故事和革命道理，不几天大家就成了好朋友。这个工作团的负责人叫黄民兴，是山东本地人，大高个，三十岁左右的年纪，穿戴像个农民，言谈举止行动却像个念书人，为人挺厚道。他们这些人多半是在农闲时间到附近的村庄里去活动，有时开会，讲讲话；有时个别串联，做大量的群众工作。他们讲抗日的形势，八路军的发展情况。有次他告诉我，在三十里以外桑园一带的东山里住着八路军支队，往西去沂水县蒙阴一带住着很多他们的队伍。八路军还在沂水县岸堤村办了一所抗日军政干部学校，专门招收青年人去学习。一听说有学校能学习，我心里挺高兴，要求他们介绍我去学习。他们说，你得回家里商量好，同意你去，并要下决心不怕吃苦才行。我心急如火，说我一切没问题，你们就说怎么个去法吧！

老黄同志见我执意要去，就给我写个二指宽的小纸条，拿着到三十里地外的东山里去找八路军的一个司令部。这个小纸条可起作用啦，到司令部没用说啥，他们就给我换了一个有公章的介绍信，上面写着到军政干校学习的字样，我就像过去考学被录取一样的兴奋，心里甜滋滋的。当天下午我回到家里，把去军政干校学习的事情，告诉了二老爹娘和伯父。老人家什么“好人不当兵、好铁不捻钉”的旧思想很浓，家里人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，有的支持我去，有的人说这次上学可不同于以往，这回是当八路军可不是小事啊！不管家里人怎么说，你有千条妙计，我有一定之规，主意已定，冲破家庭阻拦，第二天一早就上路了。

一口气我走完了六十多里路，到了沂水县山东军区司令部。一位四十多岁的同志接待了我，很客气，也很热情。我把介绍信交给了他，后来才知道他是宣传部长孙陶林同志。换完去军政干校的介绍信，天色已晚，他们就给我安排去招待所，招待所分派我住在一间没有门，又没有灯，黑洞洞的场院屋子里，地上铺的是谷草，当然更谈不上铺盖了，我囫圇个身躺下，壮着胆子睡着了。说实在的在家里上厕所还得找个人作伴，可这回就我一个人，确是一次锻炼和考验，这件事使我终生难忘。

天刚亮，我就爬起来向军政干部学校所在地岸堤村奔去，从司令部驻地到岸堤村足有六十里路之遥，中午刚过我就赶到了，一路上我也没吃饭，一直办完手续，编入青年队，太阳已经偏西了，指导员给我打来饭，我才吃上。青年队是一个区队，全队不足四十人，都是青年，舒队长和王指导员，比我们年龄大不几岁，就由他们俩领着我们学习和操练，有着严明的组织纪律。同志们之间都是互相

帮助，互相学习，互相体贴，不分彼此，团结向上，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。我成了这个大家庭的一员——八路军战士。

学习生活很紧张，也很艰苦，全队住在一个三间房子的大屋里，对面搭的草铺，没有铺盖，各个人都用自己随身穿戴的衣物，起来一身，躺下一铺，每天天刚刚放亮就起床，没有武器，都是徒手操练，跑步。跑到河边，打开冰就洗脸，虽然手裂了，脸也冻出了口子，但没有人叫苦，大家都有一个简单的想法，“不能吃苦，怎么能抗日！”所以，同志们每天都参加刻苦锻炼。

上课不是在操场就是在树林里，记笔记都垫在自己的膝盖上，但学习都很认真，成绩都很突出。青年队理论课比较多，多是《日本问题》、《中国现代革命史》、《论持久战》，《游击战》等课。利用课余时间学些歌曲。其中校歌和毕业歌给同学们的教育影响很深。抗大校歌的第一句是：“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子孙……”每唱到或听到这雄壮有力的歌调，就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；毕业歌有句是“别了，别了同学们，再见在前线……”在那战火纷飞的时代，同志们若在前线重逢，不知该有高兴！

在干校学习中，受到了过组织生活的严格训练。三天两头就开生活检讨会，检查一下自己一天或几天的生活情况，存在那些优点和不足。在生活检讨会上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互相以诚相见。提批评意见，开始时感到很新鲜，也有些不习惯，听到批评意见还有点不好意思，有时脸上发烧，后来时间长了，也就习惯了，由于这样做，我们四十人的一个区队，就成了团结紧张，严肃活泼的战斗集体。

三个月的战斗生活，通过学习革命理论和组织教育及战友们互

相帮助，使我的觉悟不断提高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穷人说话的，为穷人打天下，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，是坚决抗日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，是由先进分子所组成。我坚定了入党的信念，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组织认为我进步较快，指导员王玉书同志和舒队长两个人介绍我入党，干校为新入党的一批同志，举行了入党宣誓大会，表示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，为共产主义献出全部智慧和生命。

做 青 救 会 工 作

抗日军政干校学习三个月后，原则上规定是那来回那去。我回到莒县，接上了关系，县委决定让我在县委青年部工作。一九四〇年莒县、日照，三、二边区青年救国会成立，我任区青救会主任。青救会就相当于现在共青团组织一样，作党的助手，围绕党的抗日中心任务而开展工作，把青年群众组织起来作战勤工作。妇女做军鞋，给驻军缝缝补补；男青年负责站岗放哨，抬担架、参军参战等。由于青年救国会组织做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，山东青年参军是非常踊跃的，山东八路军的队伍，发展的也是较快的。

另外，组织青年宣传队，宣传党的方针、政策和抗日的大好形势，青年是一支活跃的抗日主要力量。

一九四一年春节刚过，一一五师解放赣榆，使莒县、日照、苏北连成一片，为创建山东滨海区根据地打了新局面，这是一次较大的胜利。这时我是县青救会的负责人之一，我代表莒南县青救会前去慰问，荣幸的受到罗荣桓同志的接见。虽然四十多年来我只有这一次机会见到罗将军，但罗荣桓同志的英武形象却深深地印在我的

脑海里。

罗荣桓同志的外貌很威武，身躯高大魁梧，两只大环眼，炯炯有神，讲话声音洪亮，令人不由的产生一种敬畏的感觉，然而当你与他一接触，却使你顿时产生另一种不同的感觉。他是那样热情、亲切，和蔼谦逊。他见到我，首先伸出那只大而有力的右手，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并因为我个子小便稍倾着上身，说：“谢谢你们，谢谢乡亲们！”罗政委留我们同他共进晚餐，我才知道他喜欢吃辣的。在餐桌上摆的几种菜，不管是炒肉还是鸡蛋都是辣的。虽然时间很短暂，但我那种年轻人的腼腆拘束心情很快就消失了，事后我常常想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大人物，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大官真是和气哩！

奔向革命圣地——延安

一九四一年，山东军区抽调一批青年干部到延安去学习。这次去延安的共一百人。有的来自地方，有的从军队调来的，来自山东各个地区，六月末开始在青驼寺集中，七月十二日组建成一个行军区队，发军衣、行李，指定干部，记得指导员是李义仲同志，区队长姓张，是军队里的一位连长。当晚就出发了，行程整六个月，一直到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二日到达延安，长途行军跋山涉水，有时还遇到敌入的阻截，每天都要走百八十里地，对我们这些青年新战士来说，真可就是个长征啊！

在这一百人里，我的年令比较小。我在班上当政治战士，按任务在行军中帮助班长搞点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工作。但开始时，由于我个子小，力气不佳，常常落后，跟不上队伍，不但不能帮助别

人，反而还得别人帮助我，感到非常着急上火觉得没完成任务。过了十几天，情况才有了好转，脚上的泡变成了硬茧，走路不再掉队了，也能做一些工作了。到驻地或休息时，能主动的找活干，抢活干，给同志烧洗脚水，让同志们先洗。行军中能帮助别的同志拿点衣物，对病号能照顾了。有天一个同志清晨起不来床，肚子疼，扶他上厕所，给他打饭，用心照管，使他的病很快好转。有的同志情绪不高，做点政治思想工作，解除思想疙瘩

我们走到河北境界，正遇到当地雨多，发了大水，平地水深就没膝盖。我们在水中行军找不到道，只好找老乡给代路。这样的路我们走了三天三夜，非常难走，一不小心就摔倒了。大家都弄得满身是泥水，夜间行军就更困难了。我们队伍里只有一个女同志，她叫李克郁，是和我一个地区来的，她走这路，困难就更多了，怕水，还走不动。她的东西分散开，同志们给背着，在水里还得两个男同志架着她走。这段路真有点象二万五千里长征过草地一样。还走了一段路，那个地方没有好水吃，盐是苦的。这里喝的水都是有臭味的。这个地方没有水井，吃水都是积攒的雨水和雪水，每家每户都有三、四个土井，把雨雪收到里面待沉淀澄清后就做吃水饮用。用过的水象洗脸、洗衣服的水再攒起来，经过第二次沉淀后，再拿来用。味道就更难闻了，就和泔水一样。

这里的盐是苦的，吃菜不放盐不行，放了盐就苦的不能吃。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，这两天吃不好喝不足，真是有点不好过。大家都很累。好在时间很短，就离开了。

在这次行军中，顶数过平汉路最难了。敌人为了确保他的运输，防止我军民破路，他在铁路两侧挖了又深又宽的大封锁沟，并

用装甲车在路上经常巡逻。我们要通过这段路，必须事前先与铁路两侧根据地的军队联系好，由两侧的我军护送和护迎，方可安全过去。两侧的根据地相距二百多里地，这二百多里路要用一夜的时间走完。行军几乎是小跑，任务非常的艰巨。我们在这里耽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过了两次才过去的。

第一次是在一个傍晚从根据地出发，一直走到后半夜两点多钟才到路边，趴在路边等着，结果对面迎接部队没有来，不得不又返回原来驻地。回返就要白天通过敌占区，在敌人的据点炮楼间通过，情况是非常紧张。好在敌人事先没有什么准备，我们的突然出现又有大部队掩护，敌人只能打枪打炮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阻截，我们无伤亡返回了根据地。在根据地又等了半个多月才联系妥。第二次照样在傍晚时分，从根据地出发，以便于在黑夜里通过敌占区，免受阻截，到路边总得后半夜。事先由两侧负责护送的军队把封锁沟垫平一段能走的路来，让我们通过。军队的同志在路两侧布置好战斗掩护。这个晚上正好是旧历十四、五，天气晴朗，皓月当空，我们正在迅速而肃静的通过铁道时，敌人的巡逻装甲车到了，我们的军队从两侧向车上敌人发起火力攻击，敌人也从车里向外打枪打炮。过路的人就在这炮火声中，硝烟弥漫处通过。路两侧都是开阔地，没有掩避的地方，我们只好弯着腰，急促地跑步通过。一直到我们过了铁路十来里路时枪炮声才停下来。第二天上午十点钟以后，我们才脱离敌侦区，来到了根据地，这时心里才安然，空气好像也格外新鲜，这次过路，我们当中有两位同志受伤，留在根据地里养伤。这两位同志比我们晚一年才到达延安城。